

明代通鑑學研究

左桂秋 著



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

MingDai TongJianXue YanJiu

明代通鉴学研究

左桂秋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通鉴学研究/左桂秋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81125-337-5

I. 明… II. 左… III. 资治通鉴—研究—中国—明代
IV. 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632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cbse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纪丽真 电 话 0532—85902342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0 mm×203 mm

印 张 7.375

字 数 205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目次

引言	(1)
一、通鉴学研究范围的界定	(1)
二、通鉴学研究现状	(2)
三、本书的研究意义及思路	(5)
四、本书架构	(7)
 第一章 明代通鉴学的渊源	(8)
第一节 宋代通鉴学	(8)
一、《资治通鉴》产生的学术背景	(8)
二、《通鉴》在北宋	(17)
三、异彩纷呈的南宋通鉴学	(19)
第二节 元代通鉴学	(30)
一、元统治者对《资治通鉴》的重视	(31)
二、元代的续补《通鉴》著作	(34)
三、元代学者对《纲目》的阐释	(36)
 第二章 明代通鉴学的流变	(39)
第一节 明前期的通鉴学	(40)
一、敕修特色	(40)
二、《通鉴》节本的盛行	(50)
第二节 明后期的通鉴学	(52)
一、张居正的《通鉴直解》	(53)
二、学者层面的多元化阐释	(54)

2 明代通鉴学研究

三、大众层面的知识普及——纲鉴史书的盛行·····	(57)
第三节 明代通鉴学流变总结·····	(66)
一、明代通鉴学流变概述·····	(66)
二、明代通鉴学流变原因探析·····	(67)
第三章 明代通鉴学的“明道”观·····	(72)
第一节 理学对明代通鉴学之影响·····	(72)
一、理学与明代之前的通鉴学·····	(72)
二、朱熹理学影响下的明前期通鉴学 ——对“明道”观念的因袭·····	(76)
三、明后期理学的内部转型对通鉴学的影响·····	(84)
第二节 明代通鉴学的经史观·····	(92)
一、明以前通鉴学之经史观·····	(92)
二、继承与突破——明代通鉴学的经史观·····	(94)
第三节 明代通鉴学的正统观·····	(103)
一、明以前的通鉴学之正统观·····	(103)
二、道德色彩趋浓的明代通鉴学之正统观·····	(107)
第四章 明代通鉴学的“资治”观·····	(117)
第一节 明代通鉴学“资治”观概说·····	(117)
一、明之前通鉴学的“资治”观·····	(117)
二、明代对通鉴学“资治”功能的认识·····	(119)
第二节 王宗沐《续资治通鉴》的“资治”特色·····	(129)
一、王宗沐对“事功”的追求·····	(129)
二、《续资治通鉴》的“资治”特色·····	(131)
第五章 明代通鉴学的“求真”观·····	(137)
第一节 明代通鉴学对史学“求真”属性的认识·····	(137)

一、明之前通鉴学“求真”史回顾	(137)
二、明代通鉴学著作的“求真”认识分析	(142)
第二节 明末通鉴学“求真”的新趋向	(150)
一、《通鉴补》与《纲目续麟》的怀疑精神	(151)
二、《通鉴补》与《纲目续麟》对史学“求真”的探寻	(157)
 第六章 明代通鉴学的启示	(168)
一、清代通鉴学概述	(168)
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175)
三、订误《纲目》类著作	(183)
四、明代通鉴学之评价及对当今史学的启示	(187)
 附录一：宋至清代通鉴学著作略览	(191)
附录二：宋至清代通鉴学著作刊刻略览	(195)
参考文献	(219)
后记	(227)

引言

一、通鉴学研究范围的界定

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①是我国史学史上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书共 294 卷,叙述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403 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年)共计 1362 年的史事。《通鉴》自成书后,即因其“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经世功用及“参考群书,评其同异”的求真精神而受到历代统治者及学者的重视与信任,成为上自皇室、下至平民的必备史籍。同时,历代都有不少学者对《通鉴》进行续作、改编、注释及校勘等各项研究,由此一部《通鉴》原典而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通鉴学。其中的代表作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及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通鉴》进行了扩展,构筑起博大精深的通鉴学体系,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一道独特而重要的景观。因此,对通鉴学进行专题研究,对于更深入透彻地了解中国古代史学史应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研究通鉴学,首先需要界定的是通鉴学的研究范围。本书把对《通鉴》文本本身进行续作、改编、注释、评论的著作都纳入了研

^① 为表述之方便,下文中均简称为《通鉴》。

究范畴。^① 这里需要特别进行分析甄别的是对《通鉴》的改编类著作的界定。南宋时期出现了两部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的《通鉴》改编著作：一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二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这两部史书是通鉴学的重要著作。它们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体例的创新，同时又形成了各自的分支——续《资治通鉴纲目》^②史书和续《通鉴纪事本末》史书。在史学发展史中，《纲目》与《通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通鉴史书与纲目史书互相借鉴，互相改编，呈现出一种不可分离、互相渗透的关系。因此，为了尽可能地显现通鉴学的全貌，本书将标有“通鉴”之名的纲目史书均纳入了研究范围。

本书没有将续《通鉴纪事本末》史书纳入研究范围。张煦侯先生认为，续《通鉴纪事本末》的史著，如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代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并不属于通鉴学范畴，“其所据之底本并非编年，乃直用《通鉴纪事本末》之体，自为采撰，与袁书之改纂《通鉴》者又自不同。则是虽名为《纪事本末》，核其诱因，又有貌同心异之别。”^③笔者也认为不论是从书名还是从内容来分析，这些续作之书都与《通鉴》原书无太大联系，因此，本书依据张煦侯先生的分法，没将这些续《通鉴纪事本末》之作纳入通鉴学的研究范围。

二、通鉴学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通鉴》原典的研究在不断深化，相

① 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进行综述，本书不仅将包括纲目、纲鉴在内的以叙述皇朝兴亡之迹为主旨、突出政治史为目的的编年体通史著作涵括在内，而且将对《通鉴》系列的体例、内容等进行续作、改编、注释、评论的研究性著作也纳入到“通鉴学”的范畴之中。

② 为表述之方便，下文中均简称为《纲目》。

③ 参见张煦侯《通鉴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继涌现出一大批《通鉴》相关的研究专著和普及读物^①,同时,《通鉴》研究论文的数量也蔚为可观。^② 尽管《通鉴》研究的著述宏富,但学术界对通鉴学的研究却十分薄弱,下面将学术界对通鉴学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张煦侯先生的《通鉴学》^③是迄今为止唯一以“通鉴学”命名,全面研究和介绍《通鉴》的专著。此书共分七章,分别为编年史之回溯、通鉴編集始末、通鉴之史料及其鉴别、通鉴史学一斑、通鉴之书法、通鉴之枝属与后继、通鉴之得失与编年史之改造。此书是研究《通鉴》的权威之作,“把前人研究《通鉴》的成果搜罗已尽,是治《通鉴》者不可不读之书”^④。《通鉴学》的关注重点在于《通鉴》原典本身,对整个通鉴学的脉络亦有专章叙述,即第六章“通鉴之枝属与后继”。此章为通鉴学之综述,叙列了通鉴学著作的作者及主要内容,未对通鉴学的内部流变思路展开论述。

诸多史学史专著^⑤在对《通鉴》进行评述时,对通鉴学诸书略有提及或简要介绍。李宗侗先生在其《中国史学史》第八章“资治通鉴及其同类书”中对通鉴学进行过论述,此章主要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诸家续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

① 如,刘乃和、宋衍申主编的《〈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柏杨的《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中国友谊出版社 1984 年版;沈志华等主编的《白话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等等。

② 学者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通鉴》的编修分工与提纲问题、《通鉴》的评价问题、《通鉴》史实的考证问题这几个方面。关于《通鉴》的研究概况,详参宋衍申的《〈资治通鉴〉研究概述》,见刘乃和、宋衍申主编的《〈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6 页。

③ 此书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于 1948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再版。

④ 宋衍申《〈资治通鉴〉研究概述》,见刘乃和、宋衍申主编的《〈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 页。

⑤ 如,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 年版;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鉴纪事本末”这五小节对通鉴学进行了简述。尹达先生认为“《通鉴》之后形成了一个从古到今的编年体史书系统”^①，他言简意赅地用了两页的篇幅对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等三四部重要的通鉴学著作进行了介绍。金毓黻先生亦在其“编年体之通鉴”的小节中略述通鉴学著作之大概。这些史学史专著与张煦侯《通鉴学》的视野相似，它们对通鉴学著作的介绍多为综述性质，未对通鉴学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亦未涉及到通鉴学流变的内在思路及时代特色。

从专题论文的角度而言，据笔者目前所见，只有六篇论文涉及到通鉴学。陈光崇先生在其《“通鉴学”的形成和展望》^②中对通鉴学的种类进行了简述。葛兆光先生著有《从〈通鉴〉到〈纲目〉——宋代通鉴学之一脉》一文。^③瞿林东先生的《元代“通鉴”学和〈通鉴〉胡注》^④略举元代通鉴学之大概，并以此作为学术背景，重点剖析了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吴振清先生的《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⑤亦在略述明代通鉴学著作的作者及内容之后，着重于评价明末学者严衍所著的《资治通鉴补》。因这三篇专题论文的关注点并非通鉴学之解析，因此，作者均略述了通鉴学之大概，同样未对通鉴学展开详细具体的论述与分析。近两年来，通鉴学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吴凤霞的《金代〈通鉴〉学及其特点》及傅骏的《金元通鉴学之研究》对金元通鉴学进行了梳理。^⑥

具体到明代通鉴学，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清人对明

①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

② 载于陈光崇《通鉴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191页。

③ 载于《扬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④ 载于《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

⑤ 载于《北方论丛》1997年第2期。

⑥ 吴凤霞的《金代〈通鉴〉学及其特点》一文载于《北方文物》2007年第1期；傅骏的《金元通鉴学之研究》，2007年博士论文。

代史学的鄙薄对后世学者影响颇深,明代史学“苍白”、“浅陋”几成学术界之共识,明代史学也因此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直至20世纪80年代,明代史学研究才“渐趋繁荣”^①。然而明代通鉴学研究仍处于较为荒凉的边缘地带,研究成果甚少。明代史学的相关专著^②,或是提及明代通鉴学中的某些著作,或是分析某些通鉴学者的思想,或是阐释了明代通鉴学的某些特性,这些专著对明代通鉴学的研究还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在专题论文方面,除了前文提及的吴振清先生的《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之外,还有冯惠民的《试论严衍的〈通鉴补〉》、纪德君的《明代“通鉴”类史书之普及与“按鉴”通俗演义之兴起》、王秀丽的《续资治通鉴纲目纂修二题》、宋衍申的《关于〈资治通鉴补〉》。

分析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迄今为止的与通鉴学相关的研究角度单一,范围比较狭窄。重《通鉴》轻通鉴学、重单篇著作而轻整体分析是其共同的弱点。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尚缺乏对通鉴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及对内在思路流变的系统分析,笔者尚未发现学术界对通鉴学进行过深入的长时段的专题研究。因此,基于通鉴学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当前研究的薄弱状况,笔者选定通鉴学作为研究对象。

三、本书的研究意义及思路

本书之所以截取明代作为整个通鉴学研究的切入点,是由明代通鉴学的学术价值及社会价值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① 钱茂伟先生认为这种“繁荣”主要表现为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条件的成熟及研究成果的繁荣这几方面。见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叙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② 如,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傅玉璋、傅正《明清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等等。

从学术层面而言,明代通鉴学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思想发展的特殊阶段。明代中后期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开始转型的早期阶段,处在这一变革时期的通鉴学明显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趋向。因此,明代通鉴学由前期到后期的流变也就相对地具有了典型性。同时,明代通鉴学还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特殊阶段,理学内部由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的转变对明代通鉴学也影响甚深。总之,作为一面镜子,明代通鉴学充分体现出明代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因素对史学的冲击及史学为之做出的反馈。

从社会价值而言,在明后期通鉴学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中出现了普及化的趋向,这又体现出明代通鉴学在全社会的辐射与影响,也更真实地反映出通鉴学在史学及社会上的地位。通鉴学的普及化趋向对当今的史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在当今社会,一方面,史学研究固守于象牙塔,难以转化为社会化成果;另一方面,一些篡改历史、误导群众的所谓“演义”却大行其道,人们对历史知识的渴求得不到正确的引导。而雅俗共赏的《通鉴》正可以作为沟通学者与社会的桥梁。在此情况下,对明代通鉴学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反思其学术价值及其社会价值的转化,或许对现在的史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对历代通鉴学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挖掘与整理,并将通鉴学置于明代这一特殊的时间段里加以考察,力求将其同当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流变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从史学的最根本的“经世”与“求真”这两大特征入手,宏观地、多维地探讨它的流变及特点。笔者在试图宏观把握明代通鉴学流变特色的同时,结合个案分析,通过其纵向脉络的发展过程以及横向的比较研究,尽可能地对明代通鉴学进行切实的分析和恰当的表述,从而丰富目前尚显粗浅的明代史学研究领域。

四、本书架构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结合宋元时期的时代特色,对明代通鉴学的渊源进行大致的梳理,力求简明扼要地描述出宋元时期通鉴学的产生及发展脉络。第二章力求描绘出明代通鉴学流变之全貌,并着重探讨了政治因素及社会变迁对明代通鉴学流变的影响。第三、四、五章则以史学的“经世”与“求真”这两大根本属性为标准对明代通鉴学进行内在思想发展脉络的分析。第三章重点剖析理学对明代通鉴学的影响,即明代通鉴学经世功用中所表现出的“明道”观,从理学对明代通鉴学之影响、明代通鉴学之经史观、明代通鉴学之正统观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四章着重阐述明代通鉴学的经世功用中的“资治”观。第五章是明代通鉴学在追求“经世”功用时对史学“求真”本质看法的变迁。第六章则简述了清代通鉴学发展概况,剖析了明代通鉴学对清代通鉴学的影响,并对明代通鉴学进行了价值评价。

第一章 明代通鉴学的渊源

第一节 宋代通鉴学

《通鉴》因其极高的史学价值受到了后代统治者与学者的重视。《通鉴》著成时已近北宋末年,因此,在北宋时期尚未形成通鉴学。南宋时期,学者们对《通鉴》的研究开始逐步深入。南宋的通鉴学已粗具规模并奠定了以后通鉴学发展的基础。

一、《资治通鉴》产生的学术背景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的产生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①之结果,它吸取了以往编年体与纪传体例的优点,将我国史学的编年体史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资治通鉴》著者为北宋时期的司马光。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今属山西)人,世称涑水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所著书有《文集》80卷,《资治通鉴》294卷,《考异》30卷,《稽古录》20卷,及其他著述10余种。

当时的北宋王朝已出现种种危机,“冗官”、“冗兵”、“冗费”三冗问题日益加重。作为受传统儒家教育、具有浓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参与到当时的政治

^①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

生活中。司马光自 20 岁中进士甲科，历仕奉礼郎、大理评事、国子直讲，开封府推官，修起居注。未几，改任待制兼侍讲，对于朝廷政策多所匡正，进龙图阁直学士。据《宋史》载，司马光曾多次上疏，在反对献祥瑞、主张立太子等政治活动中屡屡表述自己的治国主张。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司马光在宋代政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当数他与王安石的新旧党之争。熙宁二年（1069 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见不同、难以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

司马光不仅是位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史学家。《宋史》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①作为学者的司马光对宋代的史学困境有着清晰的认识。司马光对史学困境的分析包括三方面：

其一，他对当时盛行的纪传体例缺陷的分析。北宋时期，纪传体正史“十七史”相继刊行，其他纪传体的杂史、别史更是浩繁。面对着汗牛充栋的史书，世人即使皓首穷经，也无法一览史书之全貌，这种望洋兴叹之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史书的厌倦与冷落。司马光对此也深有体会，“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浹”。其二，对断代记载史实缺陷的批评。面对着以十七史为主流的断代史盛行的局面，司马光认为断代为限的史学记载方法阻碍了人们对客观历史的整体把握。司马光曾向其修史助手刘恕指出：“《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因此，

^① 《宋史》卷 336，《司马光传》。

“宋人荒于史学久矣”。其三,对古老的编年体例的继承与创新。^①

① 编年体是我国最古老的史书体例,它起源于以竹简为书契的史官记注,主要按年月顺序来记述史事,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它是我国早期历史典籍的主要体裁,其中以孔子所作的《春秋》为代表,它记载了鲁国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史事,但其记事极为简略,每段记载最短的只有一个字,最多也不过40多字,因此,《春秋》虽有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尚不具备编年史之规模。刘知几将《左传》看成编年体的正宗,在《史通·六家篇》将《左传》居其一,此书为左丘明为释《春秋》而作,《春秋》仅举大纲,而《左传》则详述故事,记述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共13个君主269年的历史,全书共18万字,“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篇》),记载较为完备,体例较统一,已初步把编年体例确立起来。历代史家也公认其为编年体之真正始祖。编年体例对史实主要按照以事系时的次序来描述,这虽然具有时间次序分明,脉络清晰的优点,但其缺点也同样突出,那就是破坏了史实叙述的完整性,使完整的史实分散在史书的不同年代之下,这种支离分散不利于人们对史实的总体性把握与分析。这种缺点也促成了纪传体例的出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创立了纪传体这一新的史书体例,这种体例将当时已经出现的几种史体的长处熔铸到了一起,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对其优点作过评述:“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班固的《汉书》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使之更加完善,并开创了后来相沿不替的断代史体例,成为以后历代正史编撰的唯一体例,受到了历代统治者与史家的青睐。总体而言,汉唐之间,纪传体例在史书编撰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编年体例受到了明显的冷落。不仅自《史记》后历代正史均以纪传为体,史家修史也多用纪传体例,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汉唐之间的历史文献中,纪传体史籍“七十家,九十部,四千八十五卷”,编年体史籍仅“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由这两种体例史书数量之对比可看出史家对编年体例的冷落。但编年体例并未就此消亡。原因很简单,编年体具有某些不可替代的功能,其以时间为序的叙述方法,大小事件井然有序的排列,全面宏大的全景描写,以及它所特有的政治化作用都使它长期与纪传体并行于世。东汉献帝因班固的《汉书》文繁难省,令荀悦依《左传》编年体《汉纪》,以补纪传体史书“纪传互出,表志为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刘知几《史通·六家篇》)的缺憾。《汉纪》确立了编年体完整的规模,把编年史体向前推进一步,取得了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间编年体与纪传体“角力争光,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刘知几《史通·二体》)的地位。其后,晋袁宏《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习凿齿《汉晋春秋》、干宝、徐广《晋纪》、裴之野《宋略》、吴均《齐春秋》、何之元《梁典》等编年体断代史书不断出现,这均为以后《通鉴》的编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自班固的《汉书》与荀悦的《汉纪》问世以来,无论是纪传体史书,还是编年体史书,均以断代为限进行著述。参见来可泓《资治通鉴》与编年体,选自刘乃和、宋衍申主编《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为弥补史学因纪传体例与断代为限而带来的缺憾,司马光产生撰修一部编年体通史的想法,“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一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之书”^①,司马光洞悉当时的史学困境之后所做出的探索必然使其能在史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司马光的史学探索起始于宋英宗时期。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此即《通鉴》的原称。《续通鉴》卷64载:

(英宗治平三年)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浹,况于帝王日有万几,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办,徒有其志而无所成。顷臣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乞亦以《通志》为名。”

可以说,《通鉴》的成书从萌芽至成书都受到了宋代皇帝的支持与高度重视。神宗即位后,因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而且亲自提前写序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

^① 此段所引司马光及刘恕之语皆转引自张煦侯《通鉴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页。